

中國知識份子與烏托邦的幻滅

黃默

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

天安門：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 (*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: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, 1895–1980*)

台北時報出版社，2007年

史景遷 (Jonathan D. Spence) 著，溫洽溢譯

史景遷教授是研究中國近代、現代史的著名學者，著作等身。在余英時教授為這本書寫的序言中，提到史景遷教授早年所受嚴謹的史學訓練，又他兼具了文學上的才華，才能寫出這樣一部近乎史詩般的作品。他寫的是近百年來中國變局中知識份子的處境、追求與挫敗。百年來，中國歷經內憂外患、改革與革命，舊的秩序解體，而新的社會沒能建立起來，知識份子的處境非常地艱辛，卻又憂國憂民，如飛蛾撲火，何其悲壯。

史景遷教授在本書的序言中說：「回顧二十世紀，想要將中國革命匯聚在單一焦點上，看來是難有所得；確切地說，應當視之為交相重疊的尋尋覓覓，其中有的在得到之前許久便已捨棄，有的則是眼看伸手可得，但終究功敗垂成，即便有的確實在手了，卻是一閃而逝或者已然改頭換面。」面對這樣的情境，史景遷教授經過精心的佈局，選擇了幾位中國有名的知識份子，勾勒出他們的身世，以及他們特有的風貌與生命力量，來呈現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。他們不是近代中國政治上掌有權勢的人，但少了他們，二十世紀的歷史必將改寫。這本書敘述的主線以三個人物構成，分別是康有為、魯迅、與丁玲。另外的許多知識份子，如秋瑾、沈從文、瞿秋白、徐志摩、聞一多、小說家老舍、七〇年代的魏京生，穿梭其間，「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將之比為希臘戲劇中的歌隊，或悚懼或神迷地注視著舞台中央早已成定局的人神交戰。」他們當中，

比較敢於反抗權威的那些人，卻也不安於歌隊的角色，衝上舞台中央，而較早喪失他們的生命。他們理解到，這不是「一場能讓舞台兩旁的人安然無恙，不受牽連的戲」。

我十分同意史景遷教授的看法，試圖將中國的革命匯集在一個單一的焦點上，是件十分艱難的事情；他對華人知識份子，在回應二十世紀危機時候的表現稱讚有加，期待他的書寫「或許有助於破除西方人積習已久的迷思，一掃中國人冷漠、短視的陳腔濫調」，也讓我十分感動。但對我來說，天安門所代表的意義，是中國知識份子對烏托邦的追求與幻想的破滅。五四運動起於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的集會；文革時期，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；而在五四運動百年之後，鄧小平用武力鎮壓了在天安門聚會的學生與部份北京市的工人。這些圖像，揮之不去。我們是不是能說，中國知識份子對烏托邦的幻想與破滅，是瞭解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線索？

史景遷教授對康有為與瞿秋白的生平與活動有比較多的敘述；對陳獨秀、毛澤東與蔣介石的事蹟，也有不少涉獵。或許我們能夠透過這五個人及其追隨者的經歷，來說明知識份子的幻想與破滅。

康有為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烏托邦思想家，當是不爭之論。在康梁變法失敗以後，專心從事烏托邦學說的研究，他將儒家的思想、佛教的思想，與西方烏托邦的著作融於一爐，試圖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，影響深遠。《大同書》主張消除人類社會的種種區隔，包括家庭、性別、階級、國別、職業、與法律，並逐步邁向聯邦體制、消弭國界。又為了擺脫私有財產觀念的宰制，家庭制度也必須拋棄。他尤其強調男女的平權，對中國婦女所受的壓迫有十分生動的描述，強調每一個人在法律、選舉、受教育、服公職各方面，都應該是絕對平等的。然而，在現實的世界裡，康有為沒能將他的理想付諸實現，最後抑鬱而終。

陳獨秀的思想與立場經歷了多次的轉變。1915年，他創辦《新青年》，是當時最具影響力量的刊物。他倡導民主與科學，以對抗儒家的傳統思想，認為為了建立一個新的國家，關鍵在於引進西方社會的基本價值，堅信平等與人權。後來，在蘇聯國際共產組織引導之下，參加共產黨，並成為中國共產黨第

一任總書記。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時期，他遵循史達林的指示。但在國民黨清黨之後，被撤去黨內的職位，又為國民黨逮捕入獄。在他於 1937 年出獄以後，重新檢討民主與自由的議題，深刻地體會了在蘇聯十月革命以來，所謂「無產階級民主」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，只有維持了資產階級的民主，才能夠深化民主政治，走向真正大眾的民主。民主政治有其真實的內容，基本的條款，也就是基本的權利與自由，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，而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，而大眾所不需要的。胡適之在為《陳獨秀的論文與書信》作序的時候，稱為是陳獨秀最後的大澈大悟。¹

瞿秋白對中國哲學經典與佛學有深刻的研究。同時，既對羅素的作品感到興趣，也深受托爾斯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，但後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，並以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。1935 年初，他在福建為國民黨的偵察隊捕獲，在監獄中寫了長篇自白〈多餘的話〉。在這篇自白當中，他把自己加入共產黨，並成為共產黨的領導人，視為是一個歷史的誤會。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並行不悖。他說：「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、無政府、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，我心上就很安慰了，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、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。所不同的是手段，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，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，以至無產階級專政——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。」但他可能想像到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在毛澤東的手裡，是怎麼樣的一個樣貌？

共產黨革命早年領導人物的思想與立場，是這般地複雜與多變。那與共產黨對抗、爭奪中國領導權，幾乎成功而最後歸於失敗的蔣介石，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。蔣介石既受傳統儒家的教育，又篤信基督教。但在三〇年代，他倡導、推行「新生活運動」，一方面遵循儒家文化最保守的部份，另一方面，又師法德國與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的統治技術，在國民黨內成立「藍衣社」，企圖以此來振衰起弊，改革社會習俗，強大中國。也因此，美國學者魏斐得稱之為

1 陳獨秀，1959，《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》，自由中國社。

「儒家的法西斯主義」。²

經過幾十年的革命與內戰，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之下，擊敗了蔣介石。在長沙中學就讀的時候，毛澤東涉獵了西方的政治哲學，包括盧梭、史賓塞、及康德等；也在這個時候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在1927年3月，他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，寫了一份報告，傾向於發動農民的抗爭。他說：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繪畫繡花，不能那樣雅緻，那樣從容不迫，文質彬彬，那樣溫良恭儉讓。革命是暴動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。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。」他對革命的這個看法，在他掌握黨內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以後，一步一步付之實現。從五〇年代的反右傾運動，到大躍進、人民公社運動，到六〇年代的文化大革命。毛澤東既是一個大獨裁者，也是一個浪漫的烏托邦革命家。可以預期的，他的夢想並沒能得到實現，而為中國帶來了難以言喻的傷害。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追求烏托邦的幻想，也隨之破滅。

以上提到的幾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展開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。他們深受中國傳統的薰陶，又涉獵西方文明，但都一步一步追求烏托邦的理想。我們要怎麼樣來解釋這樣的情況呢？我初步的看法，中國知識份子對烏托邦的追求，實在來自於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的積弱不振、內外交迫。而和平的民主政治途徑，對他們來說都是緩不濟急，只能孤注一擲，試圖去實現一個最完美、最理想的社會，同時紓解心中的焦慮。康有為只是紙上談兵；陳獨秀放棄對人權與民主的追求，轉向共產主義，而最後回到民主與人權的願景；瞿秋白將馬克思思想等同於無政府主義；蔣介石也將儒家思想最保守的部份與法西斯政體結合起來，試圖重建中國。在這些人之中，毛澤東是最有實權，而能將他的思想付諸實現的革命家，也帶來最大的傷害。在文革以後，多少中國知識份子才一步一步地擺脫毛澤東思想上的宰制，重新檢討革命的意涵，重新檢討人權與民主的價值。但以當前中國的情況來說，這又是一件十分艱鉅的工程。

2 Wakeman, Frederic Jr. 1997. "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: Confucian Fascism." *The China Quarterly* 150: 395-432.